秩序·冲突·变革
——代序言

当我接受这一写作任务时，我就感到自己是在犯一个巨大的错误。及至进入写作过程我愈加确信这一感觉。20世纪的国际体系曾让众多史家、学者皓首以求而未能解其真昧，我以一个毛头小伙子的浅陋学识竟敢涉足其中，真是不自量力。然而对于秩序、冲突与变革之间关系的思考时时困扰着我、诱惑着我，使我欲罢不能，而终于形成了这篇东西。

本书并非是本世纪政治发展的简单记述，而是对历史的规律进行探讨。20世纪曾给人们留下许多深切的回忆，有惊喜也有痛苦。其中政治的发展则以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长达40年的冷战最为突出。20世纪是大国称雄的时代，但是却没有一个大国能像中世纪的庞大帝国一样雄霸天下，希特勒的德国、勃列日涅夫的苏联以及克林顿的美利坚都无法一统世界，20世纪是帝国时代的终结。一百年来的世界秩序是以战争和联盟来维系的，这与以前似乎并无区别,但是20世纪的战争与联盟都是世界范围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仅是结束了亿万人的生命，而且产生了两个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与联合国，前者仅是战争的过渡，而后者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秩序与和平的保障。20世纪的世界格局是均势的格局，无论是两极还是多极，都是一种均势的格局。正因如此，大国的冲突与协调才显得尤为重要。20世纪的大国关系是以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为线条的，其间夹着苏联的兴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与衰亡。这种霸权的更替并不是像草木荣枯一般的简单轮回，而是自有其更深刻的内涵。

20世纪政治发展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所言像一个三明治，中间是味道浓重如火腿和红肠的战争年代，两头的和平却似全麦面包一般干涩、无味，令人无所适从。因而他认为从1914－1991年的历史即是20世纪的浓缩版本。我本人并不同意将整个20世纪作为国际政治的研究单位，因为历史的发展既非循环又非螺旋上升，时间标尺的延伸并不能提供给我们社会发展的保证。这种按时间单位切割历史的研究方法是不科学、不严肃的，历史发展有其本身的规律，人们认识历史很难做到与其内在规律相吻合，而大多是凭借以往的经验来推测，惟其如此，我们才更应该首先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应用我们的经验，而不是相反。站在20世纪的末端，我们能够确定地说这个时代比以往真正进步的东西究竟有多少呢？人口、科技、经济、政治体系还是道德、文化？比起1914年，我们现有的地球居民增加了三倍，然而人口的增加和平均寿命的延长又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我们今后要在更为拥挤的世界上生活更长时间。科技的发展使我们的联系更加方便了，使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使我们开发自然的能力强大到可以随时毁灭地球，毁灭我们自己。20世纪的表象太过眩目，使人们难以认清其内在的规律。当20世纪即将结束时，当那艘满载着西方世界的繁荣与堕落、奢华与贫困的“泰坦尼克”号巨轮经历了八十多年的沉寂又驶回人们眼前时，当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警言与斯宾格勒对西方没落的惊呼遥相呼应时，当北约空袭南联盟的战火在夜空中礼花般闪亮升起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20世纪世界舞台所有令人目眩的剧目并未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才开始反思文明发展的真正内质……

本书的题目是讨论所谓的政治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冲突（conflict）一词来源于宗教，原指教派之间的对立，国际政治借用这

一术语是要表明一种政治单位之间相互对立或敌对的状态。冲突不同于战争，前者的烈度不如后者，但持续性有甚于后者。一般认为冲突是非常态的政治，文明的政治是应以合作与秩序为基础的。然而从语义学的角度去分析，任何标明过程与状态的语词都可以进行量化的分析，从而成为一种类似光谱的量表，冲突与合作（cooperation）是这种量表的两个极端，与之相随的状态即是混乱（turmoil）与秩序（order），现实的政治就是在这两种极端之间运行的。但文明社会的冲突还不同于失控或混乱，冲突可以导致一种秩序的破坏，也可以产生一种新的秩序，甚而是一种秩序化的冲突或冲突的秩序（譬如冷战）。冲突不同于无政府状态，但却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国际政治的现实即是冲突与秩序的交织。纵观 20 世纪的历史这一特点体现得异常鲜明，虽则政治冲突的范围、程度与内容比以往丰富多了，也深刻多了，但冲突的手段与方式明显地受到了限制，战争作为政治的手段其正义性基本被否定，任何冲突都被置于人道与和平的准则之下，国际法与国际组织越来越完善和得到尊重，这说明世界的秩序化程度已大大提高。这是世界文明化的表现，但同时霸权的野蛮性在文明外衣的掩盖下继续延伸着。虽然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不再那么赤裸裸了，大国对小国的宰割也不是在咖啡时间（tea break）里即可完成的了，但索洛斯却可以在一夜间摧毁东南亚的经济，比尔·盖茨可以通过视窗系统来控制世界的每一台个人电脑，比尔·克林顿也可以用卫星来监控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用制导导弹在几千公里外打击任何一个类似敌对武装的目标。世界的秩序离人们向往的公平、正义还很遥远。

秩序必然以合作为基础，然而也不能完全排除冲突。正是国家实力的不均衡和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冲突的必然性；而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与国家功能的局限也决定了各国间合作的必然性。冲突与合作正如地球的经纬一样是构成世界秩序的两条线索。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使这两条线索分散化、普遍化了，但丝毫未弱化这

两者的矛盾。冷战的结束、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西方文明的国际化、南北关系的分裂化以及美国霸权的全球化都标志着矛盾在向新的维度转化，世界处在了一个体系性变革的前沿。

回首 20 世纪的国际社会，真正称得上社会变迁的现象可以列出以下几项：

1. 帝国制结构与殖民体系的瓦解，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建立，联合国的设立与非洲的非殖民化过程是其标志；
2. 伴随着欧洲的衰落与美国的崛起，以西方文明划限的欧洲中心时代结束了，不管美国怎样标榜自己与欧洲文明的同气连枝，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繁荣正是多种文明融合的结果，西方人再也不能理直气壮地将欧洲以外的地区认做是文明的“化外之域”；
3. 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在经历了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及第三世界崛起的冲击后起死回生，充分暴露了它的脆弱性，自由市场、基督教文明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性、正义性也大打折扣，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可标榜的道德，剩下的只有实力和强权；
4. 苏联的崛起使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与资本主义体系抗衡的社会主义体系，使资本主义的各项原则有了一个可供对照和验证的样板，也使社会主义的影响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地带；而美苏的争霸又将世界带入一个长期对抗和分裂的时代，造就了能毁灭全人类的庞大核武库，从而根本改变了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和战争观念；
5. 随着 20 世纪的结束，整个世界已逐渐变为一个单一运作的整体，信息网络与跨国联系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经济不复存在，国家主权的绝对性也大为削弱，全球化正在深入国家内部建构这一类组织的新模式，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有

可能成为下个世纪全球冲突的主要形式。

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不在于复制历史，而在于前瞻未来，虽然这种预测的范围和信度是非常有限的，但却可以引导人们的行为。当福山(Fukyama）欢呼资本主义文明将终结历史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却宣布资本主义国家的终结。对当代世界体系发展的判断如此之悬殊，大概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差距，更说明了世界体系的变革确实呈现出许多自相矛盾的侧面，正如全球化是一种充满悖论（paradox)的趋势那样。

本书能够提供给读者的仅是一种分析的框架，而非具体的结论。罗伯特·吉尔平将世界政治的变革分为体系的变更、系统的变化和国家间互动的变化三个层次，又将变革的过程分为革命型和渐进型两类是有一定道理的。以往的国际政治研究过分执着于微观层次的分析，而忽视了体系变革的决定意义。如能将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观点和方法引入其中将会大大提高研究的精度与应用性。

最后，作者的努力是要将这种研究的过程通俗地展现给读者，使其能轻松地翻阅，自由地联想。为此作者采取了一种大众读物的形式，去掉了学术性规范的外壳，通篇未有一个注释，所引的文字与思想尽量在行文中说明。这样做也是因为作者深感自由思想的艰难。知识与思想对于人来说是一对矛盾，学校教育在带给人知识的同时也在扼杀着人的自由与个性，剥夺着人思考的能力。人对于历史的感觉不应是书本与概念，而是一种鲜活的时空感。陈子昂的那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正是这种时空感的绝好表述。试问有多少满腹经纶的学者能给人这种历史感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战争与和平

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极端化手段的延续。
——克劳塞维茨

和平只是两次战争的间奏。
——鲁登道夫

你可能对战争毫无兴趣，而战争却对你很有兴趣。
——托洛茨基

临近世纪末，时空的坐标似乎把我们同战争的距离越拉越远了，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生长在和平的年代以及和平的地带。偶尔听闻的战争消息也只是停留在报纸和电视上，然而最近的科索沃危机又将人们带入一种久违的战争氛围。许多人甚至对前方的战地记者有些羡慕，羡慕他们能有机会亲身感受战火。殊不知能有机会亲临战争的人都像经历了一场噩梦，滞留在南联盟的中国侨民中有个叫丁丁的小孩子回到祖国后立刻画了一幅“我爱和平”的图画向人们展示他对战争与和平的心态，平时爱玩“战争游戏”的丁丁说“再也不愿玩打仗的游戏”了。丁丁是幸运的，他可以在回国后立即投入和平的怀抱。而生活在那个“战争年代”的人们却处在逃无可逃、避无可避的困境。毫无疑问，20 世纪是人类所经历的最为可怕的时代，有数以亿万计的人死于这个世纪的无边战火。20

世纪的战争无论从规模、范围、频度和残酷程度来看都是空前的，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接踵而至更是给人类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梦魇。20世纪人们对于战争与和平的反思也是空前的，为此耗费的纸张、笔墨、树木、打字机及忙碌的电脑也无可计数。然而，只要人们生活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上，争夺权力与资源的冲突就无法避免，战争与和平的变奏还将延续下去……

第一节　20世纪的战争——起源、特性及后果

一

1999年1月19日，克林顿总统的高级助手们在白宫的地下室里举行会议，听取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关于科索沃自治计划的讲述和对南斯拉夫进行空中打击的建议。受参议院弹劾审判困扰的克林顿总统没有在场。3月25日凌晨2时30分北约空袭部队在南联盟境内投下第一颗炸弹，理由是那里的塞尔维亚人正在对科索沃的少数民族进行驱逐和“清洗”。而此时一部名为《摇尾狗》(Wag the Dog)的美国影片正在世界各地上映，影片讲述的是白宫高参们为使总统摆脱绯闻困扰而捏造出一场“虚拟战争”来混淆视听的政治丑闻。

八十五年前的塞尔维亚，也就是1914年的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夫妇遇刺于萨拉热窝，凶手是波斯尼亚出生的塞尔维亚人。1914年7月23日下午6时，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外交部发出了最后通牒，28日早晨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英国和德国出面调解，29日俄国沙皇下令全国军事总动员以支持塞尔维亚。到8月份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都卷入了这场危机。这就是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将这两个场景放在一起讲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只是想说明造成 20 世纪各种战争的背景和因素是何其复杂，何其不同，难以将其分门别类地整理、归纳；同时又可以看到一点很明显的特征，即不管这些战争有多么不同，都与大国对权力的诉求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20 世纪是大国冲突的时代　随着第一世界大战的爆发，早在帝国年代（Age of Empire）所建立起来的巨大殖民体系便开始瓦解，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开始衰落，在接连的战乱中不断缩小其版图，最终在“帝国斜阳”的挽歌声中走到了尽头，邱吉尔（1874—1965）正是这一过程的最佳见证人；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在不断地崛起，迅速地取代了衰落的欧洲而执掌了世界的霸权，在其称霸的过程中惟一与其争锋的便是地跨欧亚的庞大的苏联，而后又只经历了 70 年便自行解体了。20 世纪的战争便是在这两种坐标变换中所搭建的舞台上展开的，主要的角色除了英、美，还有集中于欧亚大陆上的德、法、俄（苏）、意大利、前奥匈帝国以及富于侵略精神的岛国——日本。

1914 年是一个分水岭，对于经历了这一分岭的那代人来说，“太平年月”一词指的就是 1914 年以前，因为在那以后，世道变迁，战乱纷呈，似乎换了一个世界。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似乎是这一变故的先兆，从那以后欧洲这艘巨轮便沉入了战乱的深渊。回首 1914 年，那个时候世界上已经有 100 年不曾打过大型战争。所谓大型战争，是指所有的大国，或至少有许多大国一起参与的战争。当时国际舞台上的主角，计有欧洲六强（英、法、俄、奥匈帝国、1871 年扩张为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加上统一之后的意大利），以及美日两国。那个时候总共只发生过一场两强以上交兵却迅即收场的战争，那就是英法两国合力对付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4—1856）。而且，就算有强国参与，多数冲突也是速战速决。至于其中打得最长久的战争，并不是国际间的冲突，而是美国境内南

北相争的四年内乱（1861－1865）。而当时一般战争的长度多以月计，有时甚至在几周内就告终了（1866年的普奥战争即为一例）。总之，从1871－1914年的几十年间，欧洲总有战事，却从来不曾有过大国军队攻入敌国境内的事例。只有在远东地区，1904－1905年，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事打得如火如荼，异常惨烈。

因此，20世纪以前，人类可说根本没有过‘世界级’的大战。18世纪英法两国曾屡屡交手，战场跨海越洋，从印度、欧洲，一直打到北美。可是1815－1914年的百年间，大国间的战争几乎都打不出自家门前的区域。帝国（或准帝国）的远征军远赴海外对付那些不听话的殖民地或落后地区则是另一回事。这一类开拔到域外的战争，往往势不均、力不敌而呈一面倒，比如美墨战争（1846－1848）、美西战争（1898），以及英法两强扩张殖民帝国势力的诸多战役均属此类。不过，偶尔一两次，也有小国寡民被欺负得太厉害，在忍无可忍之下大发威风的情况出现。像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就不得不黯然退出墨西哥；1896年，意大利也撤离了埃塞俄比亚。这些所谓的文明国家，尽管有坚船利炮的优势，但最终仍不免于功而返，甚至损兵折将。而且，这些远洋冒险般的军事行动除了给出兵国的报纸创造两条新闻之外，对欧洲的大多数居民并无多大的影响。

但是这一切，到了1914年都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了每一个强国，事实上除了西班牙、荷兰、北欧三国以及瑞士之外，全欧洲都加入了这场战争。更有甚者，各国军队还被一一派往外国执行战斗任务；许多时候，这种情况往往是破天荒第一遭。加拿大部队到法国作战；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则跑到爱琴海的一个半岛上去凝炼国家意识——“加里波里”（Gallipoli）之役变成了澳新两国立国的神话——然而，这一切现象当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改变，却要数美国人的参战。就像电影《秋日传奇》（Legend of Fall）里描写的那样，美国的青年人难得有机会表现一下自己的爱国热情。美国的加入，从此决定了20世纪历史的面貌。美国印第安人被派到欧

洲、中东；中国劳工来到西方；非洲人则成为法国部队的一员。除了中东地区之外，发生在欧洲地区以外的军事行动，规模都很小，但海战的范围却再度升格到全球范围：1914 年在南美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的外海，大战双方揭开了海战的序幕。而协约国舰队几次和德军潜艇交手的决定性战役，也都发生在北中大西洋的海面及水下。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更是毋庸置言。全世界所有的独立国几乎无一幸免，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皆受到战火波及。殖民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更是身不由己，毫无选择的余地。欧洲境内，除了日后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地区、瑞典、瑞士、葡萄牙、土耳其、西班牙；欧洲境外，除了阿富汗地区，全球各国不是加入战斗，就是遭敌占领，或两者都不能免。作战地区，遍及五大洲三大洋。南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群岛、北非沙漠、缅甸、菲律宾各地的殖民区，这些遥远陌生的地名，和北极、高加索山区、诺曼底、斯大森格勒、库尔斯克一样，都成了报纸诸者和无线电听众耳熟能详的名词，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给大家上了一堂世界地理课。

20 世纪的大小战争，不论是地区性的局部战争，还是波及全球的世界级大战，总体规模都是空前的。1816—1965 年 150 年间的各场战争，根据专家依死亡人数排名前四名都发生在 20 世纪：分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 1937 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和 50 年代的朝鲜战争，每次都死了 100 万人以上。而回到后拿破仑时代的 19 世纪，有记录可循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是 1870—1871 年的普法战争，大约死亡了 15 万人。拿到本世纪来，这个数字勉强只能跟非洲一些小国内战的伤亡规模相比。简单地说，进入 1914 年，人类从此开始了大屠杀的年代。

二

有关 20 世纪战争起源的说法正像战争本身一样纷繁复杂；对

战争原因的探求也正像统计战时阵亡人数一样难以做到十分精确。单是对两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探究就足以让许多著作问世，许多教授成名。如果连搞清一次规模较大的特定战争的原因都如此困难，那么想要从“一般”意义上去寻找战争的根源就基本上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了。 20 世纪的战争确实比以往复杂了许多，如果说 19 世纪以前的战争大多是为了争夺商业利益、领地以及殖民地而发生的话，那么 20 世纪就绝少有如此单纯的战争。战争的原因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这不仅是由于战争的发动者和参与者的目的增多了，更主要的是因为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地缘关系由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型，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以及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的兴起和美苏两级对峙格局的确立和瓦解，总之参与 20 世纪世界舞台表演的角色增加了，关系复杂了，因而政治冲突的形式、内容也就变得丰富化或复杂化了。即便是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作为行将终结的“殖民战争”旧模式的美西战争（1898）、南非战争（1899— 1902）、日俄战争（1904— 1905）以及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1900）也都具有了不同以往的特殊意义。这些战争一方面是列强为了瓜分最后的殖民地而进行的联合侵略或相互冲突，另一方面也是正在崛起的实力派国家美、日、德试探当时国际秩序的牢固程度并伺机改变它的小心尝试。

事实上，虽然每一次战争的直接原因十分错综复杂，但我们若是更换一种长焦镜头或变化一下视角，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国际战争都与大国之间谋求对他国的权力和控制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与大国之间权力的平衡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并且与这种平衡的破坏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西方研究政治冲突的学者惯常把战争的起源归结为三种模式：一是人类自身好侵略的天性（innate aggression）。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占有更多的资源是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所有动物都具备的本能。人类比其他动物更高明之处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于认识到了对他人的控制比对物质资源的控制更有效，更重要，营造一种以自己为主导的秩序，可以使别人不断地为满足自己的利益和需求服务，这远胜于自己亲躬力行的效果。国家作为人格的政治组织，完全继承了人类的这种本性，正是这种好侵略的天性导致了人类社会中以强凌弱的战争。二是国内制度(internal structure of state)。与国际政治的冲突与变革相关的最关键的国内制度问题是私人得益与公共得益的关系，即国家实力的增大和扩张是如何影响该社会那些权势集团和特定个人的得失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相一致还是相冲突？如果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对外扩张会给权势集团带来收益，或者社会的多数人确信这种预期的收益会在将来兑现，那么国家就会有一种通过战争或其他手段来改变国际体系的强大动力。但是，如果国家的对外扩张给这些集团设定了沉重的成本，乃至超过了预期的收益，就会产生强烈的反动力。这可以用来解释某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对外政策。三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international anarchy)。正像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之间为了维护观点和尊严而进行的角斗那样，国家之间也将战争作为冲突的最后解决方式。国家之间的问题在于相互间主权的独立和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权威来解决各国间的矛盾。最近 500 年来的状况一直是如此，19 世纪欧洲各国都将其国防部门毫不避讳地称为“作战部”，战争也一直被认为是国家推行对外政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正当手段；20 世纪，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虽然战争的非正义性和反人道性质已成世界性的共识，并且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调活动对冲突的控制机能也更趋完备，但是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并未有根本的改变。因之，战争作为国家间冲突的最后解决手段也从未被彻底废弃。

以上三个模型便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以分析国际战争起源的基本预设。但是用它还不能直接解释某些具体的问题。譬如，当这一预设用于解释 20 世纪战争的起源时就会碰到这样一个悖论，

为什么战争会在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最发达、最繁荣也最有秩序的欧洲爆发，而不是在亚洲或别的什么地方。事实上，自从“三十年战争”(1618—1648) 以来，欧洲除了经历过一次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5—1815）的震荡后，一直未有过席卷全欧的大规模战争。一百年来欧洲始终处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所缔造的和平之中，这是一个真正近代化的国际体系。构成欧洲国际社会的基石有两个：一个是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1625)；一个是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确定的三原则（1.君主是其国内的绝对主权者，各君主间彼此独立且平等；2.君主决定其国内的宗教信仰；3.各国间维持权力的均势）。前者的意义在于结束了宗教冲突与战争的必然联系，后者则确立了民族国家的国际准则。应该说这一国际体系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各国之间频繁的外交也对冲突的激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战争却依然无可挽回地爆发了。

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即有人预言有一场欧洲战争，到本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来临时，每个人对战争的来临也了然于胸，但确实没有人迫切希望战争的来临，相反可以绝对确定的是，1914 年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强国政府想打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可以充分说明这个情形的事实是：在与列强的政治野心直接抵触的地方，即在殖民地征服与瓜分之中，它们的无数冲突往往以某种和平安排来化解，甚至最严重的摩洛哥危机（1906 年及 1911 年）也都解除了。到了 1914 年前夕，殖民地冲突似乎已不再为互相竞争的列强带来不可解决的问题。这个事实甚至被误用来证明：帝国主义的敌对竞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无关。

当然，列强绝不是爱好和平的，更谈不上反战。即使是在它们的外交部竭力想避免一场公认的灾难时，它们还是不曾放弃打一场欧洲战争的准备。20世纪的最初 10 年，确实没有一个政府想要追求惟有诉诸战争或不断的战争威胁才能达到的目的——如希

特勒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追求的。当法国的盟国俄国，先因战争、续以失败和革命而无法动弹之际，德国的参谋长曾提出乘机攻击法国的主张，但未获批准。德国只是在 1904—1905 年，利用法国暂时孤立无援的黄金机会，对摩洛哥提出帝国主义的要求。这是一个可以处理的问题，没有人想为此挑起一场大战，实际上也不曾。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政府想打一场大战，不论它多么有野心、多么轻举妄动和不负责任。当奥皇约瑟夫一世在 1914 年向他注定要遭受毁灭命运的臣民宣布战争爆发的消息时，他曾说道："我并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尽管战火是其政府挑起的，但他这句话却是发自肺腑。

我们最多可以说，在缓缓滑向战争深渊的某一点上，战争似乎已变得不可避免，以致有些政府决定选择一个最佳或至少不是最不利的时刻率先发动战争。有人认为德国自 1912 年起便在找寻这一刻，事实上也不可能比这更早。1914 年的最后危机，是由一件不相干的暗杀所促成——一位奥地利大公在巴尔干半岛深处的一个地方大城萨拉热窝被一名学生恐怖分子暗杀。在这个危机中，奥地利当然知道它对塞尔维亚的恐吓，是冒了世界大战的风险；决定支持其盟邦的德国，则使大战的发生几无转圜余地。奥地利的陆军部长在 7 月 7 日指出："天平的倾斜对我们不利。"难道不该在它倾斜得更厉害之前动手吗？德国人也是这么想。只有在这个严格的意义上，"战争责任"的问题才略具意义。但是，如这件事所表示的，1914 年夏天的危机和之前的无数次都不一样，所有的强权都将和平一笔勾销，甚至英国也不例外——德国人原本期望英国人会保持中立，以便增加它同时打败法国和俄国的机会，（德国的战略，即 1905 年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预计先对法国发动猛烈一击，再转而对付俄国。前者意味着将入侵比利时，而这样一来遂给了英国参战的借口）。除非它们都相信和平已遭到了致命伤，否则即使到了 1914 年，仍然不会有任何列强愿意向和平挥出致命一拳。

是什么使得矛盾无法调和，又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得各国政府认为滑向战争深渊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开始在战争时机选择上的博弈？对于战争的责任，德国似乎难辞其咎，但是，挖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问题，并不等于找出“侵略者”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根源于一种愈来愈恶化，而且逐渐超出各国政府所能控制的国际形势。慢慢地，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列强集团。这种和平时期的对立集团，是首次出现的新产物。其形成基本上是由于欧洲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这个帝国是在 1864—1871 年间以外交和战争牺牲了别国的利益所建立的。它想要以和平的联盟自保，对抗主要的输家法国，而联盟又适时造成反联盟。联盟本身虽然意味着战争的可能性，却不保证战争一定发生，甚或更容易发生。事实上，德国首相俾斯麦虽然在 1871 年后的几乎 20 年间，是多边外交棋赛中众所公认的世界冠军，但他却是专心致力于维持列强之间的和平，并且十分成功。强权集团只有在联盟的对立变成永久性时，尤其是在它们之间的争执变得无法处理时，才会危及和平。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 1937— 1939 年的欧洲，面对强大起来的德国和希特勒的战争狂热，欧洲的民主国家明显地感到战争的迫近，但却无法避免自己的被迫卷入。欧洲传统的均势似乎不起作用，张伯伦拼命挥动橄榄枝，并且不惜采取牺牲小国利益和“祸水东引”的极端手法，却依然未能避免战争的爆发。

20 世纪世界战争的爆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战争的脚步越将临近时，列强之间继续战争的最终来临，席卷各国的战争总是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

由此可见，传统的欧洲均势在 20 世纪已经不再是和平的保障，相反，恰恰是这种控制机制导致了战争以这种形式爆发。同时，战争在欧洲爆发也恰恰是因为当时的欧洲是浓缩的国际社会，集中了几乎所有的世界强国。当然这也并不能使我们有理由将世界大战完全归因于欧洲均势的“失灵”或列强间关于战争的“博弈”失

败。事实上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既有列强间因工业革命而导致的经济、军事实力发展的不平衡，又有新兴强国对原有国家体系的挑战，还有民族、地缘的冲突，甚至还包括欧洲中心地位的衰落。

总之，自 1914 年起，20 世纪的所有重要战争都与国际体系的变革及某种国际秩序的确立有关。因此，我们可以将分析的框架建立在三个层次上：

1. 国际体系的变革，包括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变化。国际经济与社会联系方式的转变，民族、种族及地缘关系的变化等；
2. 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冲突控制方式的变化；
3. 国家内部制度、经济与社会状况、阶级对比的变化所导致的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

三

现实的压力往往会刺激人的想象力，生活在冷战年代核阴影里的西方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关于未来战争的猜测，由此而产生的类似《星球大战》的好莱坞影片数以百计。自 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起，英法小说和未来学陆续推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未来战争描绘，而代表“权力意志”的哲学家尼采则以赞扬的口吻预言未来的战争“将向野蛮人招手，甚至唤起我们的兽性”。真正有预见性的却是一位犹太平民在 1898 年发表的长达六卷的《未来战争的技术、经济和政治诸种方面》（Techn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Coming War），这位名叫布赫的资本家在其著作中预测到战壕战争的军事僵局将导致长久冲突，而这种冲突必须付出的经济和人力代价，将使交战国陷入耗竭和社会革命。这本书迅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但是对军事计划却没有任何影响。

人对历史发展的预见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对于普通人而言，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和把握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我们一般都有一个观念，以为现代战争总是会影响国内每一名男女老少的生活，

需要动员绝大多数国民；我们总认为，现代战争使用的武器数量惊人，必须将整个经济实力投入其生产；我们又认为，现代战争的武器总是会造成难以形容的大量伤亡，彻底地主宰并改变交战国的面貌。殊不知，这些现象其实只有在 20 世纪以后方才发生。不错，过去的确也有过悲剧性的毁灭战争，也有过预示现代式可怕战争的先例，比如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即为一例。迄今为止，美国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还要算为时 4 年的南北战争（1861—1865），死亡男子无数，比美国后来参与的所有战争死亡总数还多，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战。

虽说 20 世纪总体战（total war）并非一开始就成庞然大物，不过从 1914 年开始，总体战的形态便已成形。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英国就已动员了 12.5% 的成年男子入伍，德国动员了 15.4%，法国动员人数几乎达 17%。到了二战，一般来说，各国积极从事军事任务的动员人数，平均约为 20%左右。我们可顺便提一下，像这样大规模的长期总动员，得靠两种力量才能维持：一靠现代化高生产力的工业经济，二靠大部分经济活动掌握在非战斗人口的手里。在传统的农业经济里，除了偶尔季节性的征用以外，就没有能力供应如此众多兵源，至少在温带气候区如此。因为到了农忙时节（比如说收获季节），全民都得出动帮助农事。其实就算在工业化的社会，长期挪用如此大量的人口，对劳动力也是一项极大的负担。这也就是现代大规模战争之下，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因而加强的原因。女子也因此走出家庭，进入社会，造成女性就业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女性就业还只是暂时情况；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成为永久性的社会现象了。

20 世纪的战争是大规模的物资战。人类在这些战争里使用和毁灭的东西，数量之高，已达前人不能想象的地步。拿破仑当年仅凭着法国全部不过 1500 发的弹药日产量，就打垮了普鲁士的军队，赢得耶拿会战（Battle of Jena）。可是后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